

“《春秋》大义”：从郑成功到连横

郑晨寅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闽学与闽南文化研究中心,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 郑成功生于明清易代之际, 遭遇家国之难, 他“性喜《春秋》”, 认同并践行《春秋》“尊王攘夷”与“大一统”“大复仇”之思想, 其诗文中亦力倡尊攘复仇、移孝为忠。如果说, 从关羽、岳飞到郑成功呈现出一种历史“镜像”的话, 那么爱国史学家连横则对于郑成功坚持“《春秋》大义”感同身受并给予高度评价。他在著作中重申“《春秋》大义”, 赞扬郑成功之精忠, 屡称“国姓”之名以追思其伟绩。我们应重新发扬《春秋》“大一统”思想、彰扬郑成功驱荷复台之事功, 以中华文化作为联结两岸民心的重要纽带, 积极谋划两岸统一大业。

[关键词] 郑成功; 连横; 《春秋》大义; 大一统

[中图分类号] K 255.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19) 01-0034-07

郑成功(1624—1662)一生抗清、驱荷、复台, 其丰功伟绩影响深远, 而连横(1878—1936)对其坚持明朝正朔、保存故国文化颇有感触, 笔者曾略作分析^[1]。邓孔昭先生也有专文^[2], 详尽列举了连横所作的包括《台湾通史》在内的有关郑成功研究著述, 强调连横的郑成功研究之于民族精神的宣扬, 并分析其对台湾民族运动的影响。2018年是连横先生诞辰140周年, 笔者以为, “《春秋》大义”乃联结郑成功与连横的精神链条, 并对两岸统一大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故拟对此作进一步探讨。

一、“《春秋》大义”与郑成功“尊王攘夷”思想

“《礼》以节人, 《乐》以发和, 《书》以道事, 《诗》以达意, 《易》以道化, 《春秋》以道义”^[3], 在古人看来, “五经”之一的《春秋》经过孔子笔削之后, 其中自有其“微言大义”, 乃代王者立法之经典。郑成功从小喜爱《春秋》, 并逐渐确立“尊王攘夷”之思想, 此既取决于《春秋》经传所承载之“大义”, 亦与明清易代之际复杂的民族矛盾及闽南地区的关帝信仰有关。

(一)《春秋》大义：“尊王攘夷”与“大一统”

“春秋”为史书名, 由来已久, 《国语·楚语上》载申叔时所言培养太子之法云: “教之《春秋》, 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 以戒劝其心。”韦昭注云: “纪人事之善恶而目以天时, 谓之‘春秋’, 周史之法也。时孔子未作《春秋》。”于此亦可见《春秋》主要功能在于“辨别善恶”。“善恶”是一种价值判断, 于《春秋》而言, 主要表现为“尊王攘夷”。《春秋》有《左氏》《公羊》《谷梁》三传, 章太炎称: “三传事迹不同, 褒贬亦不同, 而大旨则相近……内诸夏、外夷狄之义, 三传所同, 而《公羊》独著明文。”^[4]黄寿祺先生则概括为: “《春秋》一书之大要, 最重‘攘夷狄’与‘大一统’之义。”^[5]《春秋公羊传》起首释“元年春, 王正月”时即明示: “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大”者, 以之为大, 尊尚之义也; 所谓“大一统”, 即以仁义统一天下, 实行王道, 礼乐征伐自圣天子出。除此之外, “大复仇”亦为今文经学家所重。所谓“大复仇”, 是指在天下无道、政治失序的情况下力报家国之仇, 故虽有“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之说, 但对于齐

[收稿日期] 2018-09-05

[基金项目] 福建省委统战部B类人文社科项目(TB18028S)

[作者简介] 郑晨寅(1974—), 男, 福建云霄人, 教授, 主要从事儒学研究、闽南文化研究。

襄王（详见下文）、鲁庄公之复仇，《春秋》大之^①。如果这种复仇是与异族侵略有关，那么又与“攘夷狄”并无二致。

（二）明末《春秋》学与郑成功之“性喜《春秋》”

明代经学不兴，《四库全书》仅著录《春秋》学著作20余家。《五经大全》为官方教科书，其中《春秋大全》全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疏》^{[6]746}，“胡传”，即北宋胡安国之《春秋传》，其《春秋传序》将“春秋大义”概括为“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这与《孟子》所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一脉相承，只不过更具有当时的时代特征。而到了明清易代之际，《春秋》却得到空前的重视。郑成功所处的时代，正面临着“夷狄”入侵与国家分裂之危局，郑成功于此不能无感。《台湾外记》载：“（成功）性喜《春秋》，兼爱孙吴。”^{[7]32}《先王实录》“永历七年（1653）八月”条载有郑成功《禀父书》，中云：“儿初识字，辄佩服《春秋》之义。”^{[8]17}郑成功7岁自日本归国，其父郑芝龙为其延师受业，开始接受儒学教育，15岁时考取南安县学生员，弘光朝时又至南京国子监就读，学习儒家经典。据《明史·职官志》，国子监之授学“以孝弟、礼义、忠信、廉耻为本，以六经、诸史为之业”^[9]，对包括《春秋》在内的五经（六经）的学习，无疑影响着青年郑成功人格之塑造，而满洲铁骑随之南下，弘光朝又迅速败亡，其“性喜《春秋》，兼爱孙吴”，或许正与严酷的社会现实有关；而其“佩服《春秋》之义”的表现，正是对《春秋》“尊王”（大一统）与“攘夷”（大复仇）的坚持。

出于华夏中心主义的心理，处于“中国”边缘的少数民族政权，历来被目之以不知礼之“夷狄”。但明清之际，其时汉人固然以《春秋》之“尊王攘夷”相激励，而满清亦以助明复仇、行《春秋》大义自诩（顾炎武对此有所揭露，详见下文），如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后，清摄政王多尔袞致信大学士史可法，声称：“比闻道

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义。”^[10]多尔袞所言“《春秋》之义”，见于《公羊传·隐公十一年》：“《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谷梁传》略同）而史可法的回信则称：“此文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卒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②可以说，清廷窃取《春秋》“大复仇”之义，而南明则强调“大一统”之义，双方可谓各取所需；而《春秋》成为明、清交战双方占领道德制高点的利器，其重要性于此二信亦可见一斑。

郑成功既以儒学立身、性喜《春秋》，又蒙隆武帝知遇之恩，赐以国姓“朱”，其“大一统”、尊明王之思想已然根深蒂固；而其于目睹明朝及南明诸朝覆亡之悲剧后，又经历母亲惨死于清人之手（其父则先降后诛）的巨痛，国仇家恨，集于一身，于“大复仇”、攘夷狄更是义无反顾。其后驱荷、复台，作为抗清复明基地，则为“尊攘”大义的另一种表现。

（三）闽南地区关帝信仰对郑成功之影响

笔者以为，闽南地区盛行的关帝信仰对郑成功的“尊王攘夷”思想或许亦有影响，“喜读《春秋》”正是关羽与郑成功的共同点。《三国志·关羽传》引《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11]可以说，在长期演化形成的儒家正统观念与民间传说中，因熟读《春秋》（《左传》）而坚守忠义、尊奉刘氏，乃关羽有别于三国时期、乃至历史上其他骁勇过人的武将之重要原因。唐宋时关羽已配祀于武成王（姜子牙）庙，明代更是进入国家祭典，明神宗加封为“关圣帝君”，其地位达到极致。据相关研究，闽南地区关帝信仰的肇始阶段与明初的卫所

① 可参见《春秋》“庄公四年”“庄公九年”所载。

② 史可法此信乃顾诚据《史可法集》《清史列传·多尔袞传》《明季南略》校理而成，今从而引之，参见顾诚：《南明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建置有关,而其大规模建庙则主要是因为嘉靖以来的倭患^[12]。明末清初,漳州东山(铜山所)一直是郑成功军事要地,东山铜陵有关帝庙,始建于明初,为后来台湾众多关帝庙的祖庙,如明郑政权在台南所建的“祀典武庙”正是分灵于东山关帝庙^[13]。而郑成功故乡泉州关帝庙众多,其最著者如嘉靖年间重修的通淮关帝庙,泉人李光缙(1549—1623)为之作《关帝庙记》云:“今天下祠汉寿亭侯者,遍郡国而是,其在吾泉建宫毋虑百数……郡人庙侯于孔氏宫之左……侯素好《春秋》,是以明正统、仇孙曹。使其得吾夫子为依归,当其在仲由之右与!”^[14]于此记可知,明末时泉州关帝庙数以百计,郑成功就生活在这样的信仰氛围之中;而将“武圣”关羽比肩于孔子弟子中“好勇过人”之子路(仲由),并特别指出其“素好《春秋》”,这与郑成功的“性喜《春秋》,兼爱孙吴”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对应关系。

另一方面,虽然身登“帝”位,但人们还是习惯称关羽为“汉寿亭侯”(明洪武元年恢复其“汉寿亭侯”封号^[15]),因为这是关羽的第一个封号,更是汉献帝时期表封的、代表着汉家正统的封号;而据《台湾外记》载,“郑成功”之姓名亦为隆武帝所赐:“隆武奇其状,问之,对答如流。隆武抚其背曰:‘恨朕无女妻卿!’遂赐姓,兼题名‘成功’……自此中外咸称‘国姓’。”^{[7]61}郑成功对此十分珍视,其起兵所用印信即以隆武所赐之“招讨大将军印”,自称“罪臣国姓成功勤王”^{[7]81};在给荷兰人的通告、信件中,其署名则为“国姓爷”^{[8]64}“中国沿海诸军统帅国姓爷”^{[8]68}“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8]73}等,有学者认为:“国姓”两字,“不独是他光荣的锡嘉与尊严的标帜,同时更是他忠诚的象征和恭谨的境界。”^[16]

二、“《春秋》大义”在郑成功诗文中的表现

郑成功坚持奉行隆武正朔,并于隆武三年(1647)十月,“从大学士路振飞、曾樱议,颁明年隆武四年戊子大统历,用文渊阁印印之”。^[17]一直到永历三年(1649)才改奉永历正

朔。其改嘉禾为思明、改赤崁为东都明京,皆可见其寄托所在。而保留至今的郑成功诗文,亦多处可见他对于“《春秋》大义”的一以贯之。在此以其与父书、北征檄文及《陈吏部逃难南来》诗为例。

(一)《禀父书》《复父书》:“行《春秋》大义,结忠孝之局”

郑成功父亲郑芝龙受清人利诱,被挟持至北京作为人质,郑成功则以《春秋》大义来对抗清廷对其鼓吹的孝义之说,《先王实录》“永历七年(1653)八月”条载有郑成功《禀父书》,中云:

违侍膝下,八年于兹矣。吾父既不以儿为子,儿亦不敢以子自居。坐是问候阔绝,即一字亦不相通,总由时势殊异,以致骨肉悬隔。盖自古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儿初识字,辄佩服《春秋》之义。自丙戌冬父驾入京时,儿既筹之熟,而行之决矣。忽承严谕,欲儿移忠作孝,仍传清朝面谕,有原系侯伯,即与加銜等话,夫既失信于吾父,儿又安敢以父言为信邪?……我将士痛念国耻家亡,咸怒发指冠,是以有漳泉之师……且不特此也,异国之兵,如日本、柬埔寨等诸夷兵,旦晚毕至,亦欲行《春秋》大义。^{[8]17-18}

此处,郑成功强调《春秋》大义于其儿时即已根深蒂固,故不惜“大义灭亲”。顾诚先生分析当时的社会矛盾认为:“直到清兵南下,弘光朝覆亡,清廷推行一系列民族征服、民族压迫政策,民族矛盾才上升为主要矛盾。”^[18]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郑成功高扬“《春秋》大义”,可谓正得其时,他甚至欲借异国(日本、柬埔寨)之兵攘清,以复家国之仇。《先王实录》“永历八年九月”条所载郑成功《复父书》更云:“万一吾父不幸,天也、命也,儿只能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8]24}而在《先王实录》“永历十一年正月”条之《复父书》中,郑成功责怪当初郑芝龙不听劝告、自投虎穴,“无怪乎有今日也!吾父祸福存亡,儿料之已熟……清朝试思:今日之域中,是谁家之天下?”^{[8]34-35}在此,郑成功有意引用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之名言,正表明其乃以《春秋》之大义为基点,兴

师抗清复明，名正而言顺，彻底断绝清人利用其父要挟他的念头。此信回复之后不久，郑成功即率师北征，惜乎功败垂成。

（二）北征檄文：“大义严于《春秋》，首言尊攘”

从永历十一年（1657）开始，郑成功三次北征，以最后一次的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五月之征规模最大、影响最巨，是役郑成功亲率十余万大军，与鲁王旧臣张煌言合师北征，一路攻克多处要塞，直指南京，虽功亏一篑，却给予清廷极大的打击，声震东南。目前所见北征期间之檄文，当为存于《燭火录》卷二十九“顺治十六年秋七月庚申朔”所载张煌言至芜湖所传布之文，略引如下：

恢复天下兵马镇国大将军郑，为义切君亲，声援南北、计图恢复，布告同心，鼎造中兴，早膺上赏事：窃惟王者一统，治服四夷。大义严于《春秋》，首言尊攘；丰功勒于秦汉，不讳鞭驱。粤我大明三百年基业，德配唐、虞；先皇帝十七载忧勤，功侔天地。胡天不吊，国步多艰。……凡我同仇，义不共戴。勿夺先声，徒成烽火之戏；矢为后劲，同坚背水之盟。且一战而敬谨授首，再战而贝勒成擒，招来万亿游魂，屈指二三余逆，于此人力，可卜天心。瞬息夕阳，争看辽东白豕；灭此朝食，痛饮塞北黄龙。功永勒于汾阳，名当垂于淝水，世受分茅，勋同开国。谨檄。^[19]

在此，郑成功称“王者一统，治服四夷”“大义严于《春秋》，首言尊攘”“凡我同仇，义不共戴”，于“一统”“复仇”之义，再三申明，正是要以尊王攘夷、恢复中原、为君亲复仇为号召，从而布告天下、收拾民心。如前所述，当时满、汉民族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郑成功《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云：“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其尊明攘清之意即寓于悲壮慷慨之声。

（三）《陈吏部逃难南来》：“首阳采薇”与“直渡黄龙”

1661年，清军攻入云南，南明永历帝朱由榔逃到缅甸（次年为吴三桂所获并绞杀）。郑成功得知消息后，悲愤异常，作《陈吏部逃难南

来，始知今上幸缅甸，不胜悲愤，成功僻在一隅，势不及救，抱罪千古矣》（简称《陈吏部逃难南来》）二首，其一云：

闻道吾皇赋式微，哀哀二子首阳薇。频年海岛无消息，四顾苍茫泪自挥。^{[8][11]}

《诗经·邶风·式微》云：“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毛诗序》称：“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也。”郑玄《笺》则进一步解释：“黎侯为狄人所逐，弃其国而寄于卫。”郑成功用“式微”之典喻永历帝为清所逐入缅；《史记·伯夷列传》则有“首阳采薇”之典故，本诗“首阳薇”即以“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比拟殉国的南明大臣瞿式耜、何腾蛟二人，也借此寄托自己义不奉清之决心。其二云：

天以艰危付吾侪，一心一德赋同仇。最怜忠孝两难全，每忆庭闱涕泗流。

前两句借《秦风·无衣》“同仇”之语，实为再次申明《春秋》“复仇”之义，后两句以“忠孝难全”之语，抒无限悲怆之心境。其自注云：“太师为满酋诱执，迫成功降，再四思量，终无两全之美，痛愤几不欲生，惟有血战，直渡黄龙痛饮，或可迎归终养耳。屈节污身，不为也！”郑成功之不愿“屈节污身”，正因《春秋》大义高于父子之情。他念念不忘恢复中原，“直渡黄龙痛饮”乃用岳飞抗金典故，《宋史·岳飞传》载绍兴年间岳飞北伐，形势大好，岳飞与众将约定：“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20]11390-11391}而《宋史·岳飞传》又载：“（岳飞）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20]11375}缘此，郑成功之“性喜《春秋》，兼爱孙吴”又与岳飞相互辉映，二人于国家危难之际抵抗异族入侵，可谓志同道合。而岳飞与关羽往往合祀（如前述泉州通淮关帝庙于民国三年增祀岳飞，称“通淮关岳庙”），皆兼具武功与节义之象征。

三、连横对郑成功坚持“《春秋》大义”的高度评价

有学者认为：“真正对郑成功的研究，以及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对郑成功的使人信服的评价

价,只有从连横开始。”^[2]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并认为:连横对郑成功的评价,突出地表现在对“《春秋》大义”的认同上。如果说,从关羽、岳飞到郑成功呈现出一种历史“镜像”的话,那么200多年后《台湾通史》之作者、爱国史学家连横对于郑成功坚持“《春秋》大义”则心有戚戚焉。连氏祖籍漳州龙溪,康熙年间,连横的七世祖兴位公痛感明室之亡,不甘臣服于满清统治,故渡海来台,择居台南郑成功驻兵故地宁南坊马兵营,自此晚辈沿袭祖训,誓不侍清,故连横于郑成功与“《春秋》大义”感同身受并有高度评价。

(一)《告延平郡王文》重申“《春秋》之义”

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连横作《告延平郡王文》,云:

夫《春秋》之义,九世犹仇;楚国之残,三户可复。今者虏酋去位,南北共和,天命维新,发皇蹈厉,维王有灵,其左右之!^[21]

所谓“九世犹仇”,指的是齐灭纪国之事。齐襄公因纪侯谗言而被烹于周朝,九世之后,齐襄公灭纪国,《春秋·庄公四年》于此载曰:“纪侯大去其国。”《春秋公羊传》借此大加发挥:“‘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连横在推翻清政府统治后,追念郑成功“尊王攘夷”之生平大愿,作此告文,重申《春秋》之义,告王以“虏酋去位,南北共和”,其慷慨激昂之情,正可视为郑成功“大一统”与“大复仇”思想之嗣响。

(二)《台湾通史》赞扬郑成功“精忠大义”

《台湾通史》是连横的代表作,在此书中,他多次赞扬郑成功复台开辟、存明正朔的忠义气节,在此仅略举几例。如《职官志》称:“台湾固我族开辟之土,延平既至,析疆行政,抚育元元,而我颠沛流离之民,乃得凭借威灵,安生乐业,此天之默相黄胄,而故留此海外乾坤,以存明朔也。”^{[22]103}《典礼志》称:“延平郡王为台烈祖,精忠大义,没而为神,台人祀之。”^{[22]181}郑氏政权虽孤悬海外,对明朝乃恪守臣礼:“郑氏之时,朔望必朝,每有封拜,辄朝服北向,望永历帝座疏而焚之,君虽不在,不敢忘也。”^{[22]176}

此亦《春秋》“尊王”之义。而郑成功的“精忠大义”亦吸引志同道合之士前来投奔,《诸老列传》称:

正气之存天壤也大矣……伯夷、叔齐独耻其行,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及饿且死;此则所谓求仁得仁者也。明亡之季,大盗窃国,客帝移权,缙绅稽顙,若崩厥角,民彝荡尽,恬不知耻。而我延平郡王独伸大义于天下,开府思明,经略闽粤。一时熊黑之士、不二心之臣,奔走疏附,争趋国难。虽北伐无绩,师沮金陵,而辟地东都,以绵明朔,谓非正气之存乎?^{[22]544-545}

值得注意的是,“明亡之季,大盗窃国”之语,当本于顾炎武《日知录》卷四“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顾氏在批评杜预为陈国大夫公孙宁、仪行父之恶行辩解时(见《春秋·宣公十一年》),托以寓言云:“有盗于此,将劫一富室,至中途而其主为仆所弑。盗遂入其家,杀其仆,曰:吾报尔仇矣。遂有其田宅货财,子其子,孙其孙,其子孙亦遂奉之为祖父。呜呼!有是理乎?《春秋》之所谓‘乱臣贼子’者,非此而谁邪?”^{[6]163}故由此可知,郑成功“独伸大义于天下”,即为坚持《春秋》之义;而以伯夷、叔齐比之归附诸臣,暗合郑成功《陈吏部逃难南来》一诗所用“首阳薇”之典。

(三)屡称“国姓”以追思郑成功伟绩

连横称呼郑成功时,直称其名者甚少,大多或称“延平(郡王)”,或称“国姓”。尤其后者,如上文所述,本为郑成功所自珍,因为在君主制社会中,赐姓、赐名皆为帝王对臣子示以褒奖之举,故连横盛称“国姓”,实乃蕴含着追思郑成功发扬《春秋》大义、开疆拓土、保存故国文化之伟绩。《雅言》于此有所说明:“延平郡王肇造东都,保存明朔,精忠大义,震曜坤輿。台人敬之如神,建庙奉祀,尊之为‘开台圣王’,或称‘国姓公’,未敢以名之也。”^{[23]24}《雅言》又说:“延平郡王为台烈祖,威棱所被,远及遐荒。故台之地名,每冠以‘国姓’二字,昭其德也……伟人之功大矣哉!”^{[23]126}其《雅堂笔记》有“国姓港”,云:“延平入台,泊舟于此。而台湾以‘国姓’名地者,尚有数处。山川草木,由我发扬,正朔衣冠,俾无限落,故后人追溯其本,肇锡佳名,以传千古,是亦崇德报

功之意也。”^{[24]168}“国姓埔”则云：“国姓埔在淡水东北，地处海滨，风光甚美。相传延平郡王既克台湾，而荷人仍据北鄙，发师逐之，由此上陆……是台北者固郑氏威棱所至之地。长刀大斧，以拓版图，至今犹受其赐，我子孙可不念哉！”^{[24]144}其追思之情，在在可见。

总之，从郑成功到连横，“《春秋》大义”的文化血脉一以贯之。连横曾讴歌郑成功：“故土归疆域，新皋辟市廛”、“正朔存荒服，衣冠守汉筵”（《春日谒延平郡王祠》）；而1943年3月1日，在大陆参加抗战的台湾义勇队于石井祭郑成功之文中亦有“《春秋》一义，始终一衷”^[25]之语。时至今日，郑成功存明、开台之功仍为民众所感念，郑成功信仰普遍存在于海峡两岸。其中，广西平南上渡镇有全国最早的郑成功祠（始建于1697年），台湾桃园芦洲区则有独特的“国姓醮典”，而郑成功庙宇遍布台湾各地^①。台湾曾历经长达50年之久的日据时期、光复后又面临两岸长期分治之现实，但至今“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的信念依然契合两岸主流民意，这不能不说与郑成功坚持“《春秋》大义”以及连横对此的大力揭扬有重要关系。以“五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经典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连横在日本殖民者极力推行殖民文化的艰难处境中，仍然坚持《台湾通史》的写作，其目的即在于开启台湾民智、传承中华文化，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解放。今天，我们理应重新发扬《春秋》“大一统”思想、彰扬郑成功驱荷复台之事功，以中华文化作为联结两岸民心的重要纽带，反对外来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积极谋划两岸统一大业。

[参考文献]

- [1] 郑晨寅. 郑成功“返本”与“开新”思想探论[J]. 闽学研究, 2016(1): 42-46.
- [2] 邓孔昭. 连横的郑成功研究及其对台湾抗日民族运动的影响[J]. 台湾研究, 2007(2): 50-54.
- [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3297.
- [4] 章太炎. 国学讲演录[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113-125.
- [5] 黄寿祺. 群经要略[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165.
- [6] 顾炎武. 日知录[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 [7] 江日昇. 台湾外记[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 [8] 何丙仲, 点校. 延平二王遗集[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 [9]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789.
- [10] 赵尔巽, 等.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9026-9027.
- [11] 陈寿, 撰. 裴松之, 注. 吴金华, 点校. 三国志[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6: 633.
- [12] 郑镛. 闽南民间诸神探源[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9: 169-174.
- [13] 段凌平. 漳台民间信仰[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 103.
- [14] 怀荫布. (乾隆)泉州府志[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379-380.
- [15] 赵波. 关公文化概说[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9: 115.
- [16] 黄典权. 郑成功的名讳及赐姓问题[M]//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 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238.
- [17] 黄宗羲, 著. 吴光, 主编. 黄宗羲全集: 第二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195.
- [18] 顾诚. 南明史[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 64.
- [19] 李天根, 撰. 仓修良, 魏得良, 校点. 燹火录[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939-940.
- [20] 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21] 连横. 雅堂文集[M]. 台北: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64: 115.
- [22] 连横. 台湾通史[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1.
- [23] 连横. 雅言[M]. 台北: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63.
- [24] 连横. 雅堂笔记[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5.
- [25] 朱双一. 文学视野中的郑成功——“遗民忠义精神”及其在日据时代台湾的传衍[J]. 台湾研究集刊, 2002(3): 1-9.

① 参见李澄清:《海峡两岸奉祀郑成功之特殊信仰习俗》，泉州郑成功研究会编：《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55周年研讨会论文汇编》（内部资料），2017年版，第53-58页。

“The Core Idea of Chunqiu”: from Zhengchenggong to Lianheng

ZHENG Chen-yin

(Zhangzhou City Vocational College, Min Local Study and Minnan 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Zheng Chenggong was bor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th the family and the national disaster, he “loves the Chunqiu” and “respect for the king, against alien” and praise highly the thoughts of “unification”, “revenge”, and there are a lot of performance in the poetry. If the line from the Guan yu, Yuefei to Zhengchenggong presents a history of “mirror”, so the author of “the history of Taiwan” Lianheng adheres to the “core about chunqiu” and gives high praise. We should carry forward the “unity” about chunqiu, promote the achievement of Taiwan by zhengchenggong,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link, the affections of the connection on both sides of the stand up against the foreign forces interfer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ctively plotting cross-strait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to not be sages of blood, to complete the task of history.

Key words: Zheng chenggong; Lianheng; core idea of “Chunqiu”; unification

(责任编辑 杨中启)

(上接第 7 页)

Initial Formation of XiJinping’s View of Eliminating Poverty & Getting Rich and Its Main Factors

ZHENG You-xian

(Maxism College, Fuzhou University for Foreign Languag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Fuzhou 350202, China)

Abstract: XiJinping’s view of getting rid of poverty and getting r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went through a process. The book “Getting out of Poverty” marked the preliminary formation of Xi Jinping’s outlook on getting rid of poverty and becoming rich. “Getting Out of Poverty” has distinct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first, paying attention to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verty; second, we should emphasize the dialectical view of reality and guard against the poverty of the subject’s ideology.; third, we should advocate close ties with the masses and strive to keep our hearts close to the people; fourth, adhering to the first point of view of practice and advocating the principle of action supremacy; fifth, affirm that the poor may get rich first, and urge the “weak bird” to fly first; sixth, we should hold on to the economic center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astern Fujian; seventh, advocate unremitting dripping through stones, long-term success in order to achieve poverty relief; eighth,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light of East Fujian”.

Key words: XiJinping’s View of Eliminating Poverty and Getting Rich; initial formation; “Getting Out of Poverty”; main features

(责任编辑 陈蒙腰)